

大语言模型对比喻性反讽的翻译表现考察

——以《围城》英译为例

李恩博^{1#}, 刘倩^{2#*}

¹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济宁

²枣庄学院 山东枣庄

【摘要】大语言模型在通用文本翻译中表现出较强的语义转换能力，但其能否重构文学文本中由隐喻与反讽共同生成的复合修辞效果，仍缺少细致检验。本文以钱钟书《围城》第一至三章为语料，以概念隐喻理论与反讽语用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阐释性文本细读方法，对 Kelly 与 Mao 人工译本及 DeepSeek、Kimi 生成译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大语言模型通常能够传递句子的基本命题意义，却倾向于将文化负载隐喻释义化，使译入语中可被激活的典故和惯用表达失效；在叙述反讽中，模型对排比节奏、语域反差和叙述者疏离态度的重构不足，易将弦外之音压平为直接评价；当隐喻兼具人物贬抑和叙述反讽的双重修辞效能，隐喻映射、语用态度与文体节奏的弱化会彼此放大，形成“修辞塌陷”。两个模型呈现出的趋同倾向提示，文学翻译质量评价除语义准确性与语言流畅度外，还应纳入复合修辞在目标语中的可识别性及其整体效应。本文据此提出，在大语言模型辅助文学翻译场景下，人工译者应重点核查文化典故、隐喻链和叙述语气的协同重构。

【关键词】大语言模型；文学翻译；比喻性反讽；《围城》；修辞塌陷

【基金项目】枣庄学院教学改革立项项目（YJG24022）：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汉英翻译教学模式及其效果研究

【收稿日期】2026 年 8 月 6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9 月 8 日

【DOI】10.12208/j.ssr.20260308

An investigation into large language models' performance in translating figurative irony: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Enbo Li^{1#}, Qian Liu^{2#*}

¹Qufu Norm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²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Shandong

【Abstract】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have demonstrated strong semantic transfer capabilities in general translation, but their ability to reconstruct complex literary effects jointly produced by metaphor and irony remains underexplored. Drawing 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and pragmatic accounts of irony, this study conducts a hermeneutic close reading of selected passages from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Qian Zhongshu's *Fortress Besieged*. It compares the human translation by Jeanne Kelly and Nathan K. Mao with translations generated by DeepSeek and Kimi.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LLMs generally preserve propositional meaning but tend to paraphrase culturally embedded metaphors, weaken narrative distance and tonal contrast, and flatten stylistic rhythm. When metaphor itself carries an ironic evaluation, these losses reinforce one another, producing what this study terms "rhetorical collaps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literary translation assessment should move beyond semantic accuracy and fluency to examine whether cognitive mapping, pragmatic attitude, and stylistic rhythm remain jointly recoverable in the target text.

【Keywords】 Large language models; Literary translation; Metaphorical irony; *Fortress Besieged*; Rhetorical collapse

1 引言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推动了机器翻译

*通讯作者：刘倩

#并列第一作者：李恩博，刘倩

从句级转换向上下文生成发展。已有研究表明,大语言模型在多语种翻译中具有较好的流畅度与一定的语境适应能力,但文学文本所依赖的风格、含混、节奏和文化联想并不能被语义准确率充分衡量^[1,2]。文学翻译不是将“说了什么”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是在目标语中重新安排叙述声音、修辞结构与读者推理路径。译文即使字面正确,也可能因修辞线索消失而改变作品的审美性质。

现有人工智能文学翻译研究,多聚焦于翻译整体质量、译后编辑效率或诗歌翻译表现^[3-5];机器文学翻译评价正由可读性转向创造性与读者效应,Guerberof-Arenas 和 Toral (2022) 进一步把创造性纳入评价^[2,3]。Hendy 等^[1]证明了大语言模型的一般翻译潜力,但跨语种性能指标难以解释双关、反讽或叙述声音为何失效。吴恒球^[6]基于多维度分析发现,大语言模型译文相较原创目标语文本更具信息性、客观化和去抽象化倾向;胡健^[7]则从翻译实践出发指出,提示词驱动的一站化生成正在重构翻译过程并扩大译者的判断责任。丁颖^[8]对《小王子》多个汉译本的研究又表明,语义相似度较高并不必然带来更高的读者接受度。三类研究虽分别关注语言特征、实践过程和接受效果,却共同提示:表面正确、语义充分与文学修辞有效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

钱钟书的《围城》正是考察修辞这一问题的典型文本:书中比喻不仅是形象化表达,更是叙述者评价人物的重要手段;其反讽也很少依赖显性否定词,而是通过比喻选择、语域错位和句法节奏得以实现。隐喻翻译研究为细读提供了较成熟的工具。Newmark^[9]讨论隐喻的保留、替换和释义,Schäffner^[10]强调概念隐喻的篇章系统性;《围城》研究也注意到 Kelly 与 Mao 译本在不同文化映射条件下的选择^[11]。钱钟书的喻体还承担人物塑造和价值评判,不能只按源域与目标域的对应解释。隐喻构建认知映射,反讽则依托该映射传递叙述者的疏离和贬抑态度,本文将这种“以比喻实现反讽”的复合修辞称为“比喻性反讽”。

既有《围城》英译研究,主要从文化负载词、幽默传达及功能对等角度评析 Kelly 与 Mao 译本,较少将其与大语言模型译文纳入同一修辞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重点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大语言模型与人工译者在处理《围城》比喻性反讽时呈现出哪些稳定差异;第二,这些差异如何体现为隐喻映射、语用态度和文体节奏的协同弱化。

2 理论框架

2.1 隐喻映射、文化认知与翻译重构

概念隐喻理论提供了关于“意义如何在语言中被组织”的基本思路。Lakoff 和 Johnson (1980) 把隐喻界定为跨概念域的认知映射,意味着翻译的对象不能只被理解为某个喻体词,而应包括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关系、由这一关系激活的评价属性以及文化联想^[12]。Mandelblit (1995) 将这一认识推进到跨语言转换层面:当两种语言共享近似的概念组织时,隐喻较容易直接保留;当映射方式或文化经验不重合时,译者则需要通过替换、补偿或重构使目标语重新建立可推导的意义关系。Schäffner^[10]进一步把关注点从单个隐喻表达扩展到篇章层面的隐喻系统,强调同一认知映射往往通过多个词语和语义节点连续展开。三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判断:隐喻翻译的关键不是形式上的逐词对应,而是原文组织意义的关系结构能否在目标语中继续发挥作用。Newmark^[9]所概括的隐喻保留、替换和释义等策略因而只是实现这种功能重构的不同路径,而不能脱离具体语境被预设 of 优劣等级。

基于这一共通立场,本文在后文分析中依次考察源域—目标域映射是否仍可辨认、文化联想是否能够重新激活,以及由多个喻体构成的隐喻链是否保持语义连续。对于《围城》这类文化负载较强且兼具人物评价功能的比喻,译文即使命题意义正确,如果把高密度的惯用表达展开为知识说明,也可能出现“映射尚存而联想网络变薄”的释义化现象。

2.2 反讽推理、叙述距离与识别线索

隐喻理论主要解释意义结构如何建立,反讽理论关注的则是读者如何在字面意义之外推导叙述者的评价态度。Grice^[13]从合作原则出发,把反讽与表层话语对质量准则的显性违背联系起来;Sperber 和 Wilson^[14]以“回声式提及”说明,说话者通过回声式呈现某种话语、期待或立场,同时表达对其疏离。Attardo^[15]的“相关的不適切”进一步强调,反讽之所以能够被识别,正是因为话语与局部语境之间存在一种值得解释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仍服务于整体交际目的。Mateo^[16]把上述问题带入翻译研究,指出反讽能否跨语言传递,不仅取决于命题信息是否对应,还取决于目标语是否重新提供了足以触发反向理解的语境和语言线索。这些理论对反讽机制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但具有明显的共同前提:反讽意义不是直接编码在词句中的固定内容,而是读者依据表层表达、语境预期与说话者立场之间的距离推导出来的。

由此,文学翻译中的关键问题就不只是“译文有没有说对”,而是“译文是否仍给读者留下了推断态度的

路径”。在《围城》中,这种路径常借助表面赞许与实际贬抑之间的落差、句法递进后的突然转向、语域错位或夸张等方式建立;它们的作用不是独立制造意义,而是提示读者不要停留在字面解释。若模型把原文需要读者自行识别的态度直接改写成明确判断,译文虽然更透明,却可能同时压缩叙述距离和反讽推理空间。

2.3 比喻性反讽及复合修辞的协同重构

隐喻与反讽在《围城》中并非两个简单并列的修辞系统,而常常形成“意义建构—态度推导”的递进关系。Colston 和 Gibbs^[17]的实验研究表明,反讽理解涉及对说话者态度的进一步表征;Dyner^[18]对“metaphorical irony”的讨论则更直接指出,某些比喻性反讽存在“先隐喻、后反讽”的解释次序:读者首先从表层表达中建立隐喻意义,再在这一意义基础上推导说话者或叙述者的反讽性评价。因此,“比喻性反讽”并不是把一个隐喻和一个反讽机械叠加,而是隐喻先提供人物、事件或价值判断的认知框架,反讽再利用这一框架形成疏离、戏谑或贬抑的评价方向。两类理论在这里获得了内在连接:Lakoff 和 Johnson 等人所讨论的映射关系回答“意义怎样被构造”,Sperber 和 Wilson、Attardo 等人所讨论的语用推理回答“叙述者如何借这一意义表达态度”,Dyner 则说明二者可以在同一表达中形成顺序性的复合加工。由此也能解释为什么文学翻译不能仅凭准确度和流畅度判断质量。Wang 等^[19]针对隐喻机器翻译评价指出,常规评价往往偏重流畅度和事实可靠性,而不足以反映修辞质量;对本文而言,真正需要检验的是目标语是否同时恢复了隐喻所建构的意义关系以及依附于该关系之上的评价态度。

2.4 复合修辞的形式实现与分析框架

认知映射和语用态度并不会脱离具体语言形式独立存在。前者要通过词语选择和篇章关系被激活,后者也必须依靠可感知的文本线索提示读者超越字面意义。因此,本文在“认知映射—语用态度”之外引入第三个层面时,并不把排比、突转、语域落差或双关本身视为与认知、语用并列的理论范畴,而把它们统一理解为承载前两者的“修辞—文体线索”。这一层面的理论依据可以从前述反讽研究自然推出:Attardo^[15]所强调的语境不协调及识别信号表明,反讽推理需要一定的可感知提示;Schäffner^[10]关于篇章隐喻连续性的讨论又说明,认知映射的维持同样依赖具体语言资源在篇章中的组织。由此,修辞—文体线索承担的是“形式实现”功能,即让既有的意义结构与评价态度能够被目标语读者识别。本文所分析的排比、语义突转、语域错位、

双关、惯用表达和节奏变化,均属于所选案例中实际出现的具体实现形式,而非预先设定的一组固定指标。

据此,本文形成“意义建构—态度推导—形式实现”的递进分析框架。第一,认知层面考察隐喻映射及其文化联想能否在目标语中恢复;第二,语用层面考察叙述者的疏离、戏谑或贬抑态度是否仍可由读者推导;第三,修辞—文体层面考察承载上述意义与态度的语言线索是否得到功能性重构。第三层并非额外添加的修辞清单,而是前两层在文本中的实现条件:映射焦点的偏移可能改变反讽对象,解释性扩写可能同时缩短叙述距离并削弱节奏突转,目标语惯用资源的缺失也可能使隐喻链后的双关失去支点。当译文的命题意义基本成立,但上述层面发生联动性弱化,使目标语读者难以恢复原文的复合修辞效果时,本文将这一现象暂称为“修辞塌陷”(rhetorical collapse),这个表达并非本文援引的既定理论术语,而是本研究为描述“局部语言转换基本正确而整体复合修辞功能明显减损”这一现象提出的工作性分析概念,其适用范围限于本文所考察的译文。这样界定既避免把个案现象上升为模型的必然属性,也使后文对不同案例的比较能够围绕同一套递进标准展开。

3 研究设计

3.1 语料

本文选取《围城》第一至三章中的四个代表性片段,分别覆盖文化负载隐喻、隐喻链、叙述反讽及二者交叉的情形。对照文本包括 Kelly 与 Mao 于 1979 年出版的人工英译本^[20],以及 DeepSeek、Kimi 在同一零样本指令“请将以下中文段落翻译成英文”下生成的译文。下文四组案例中的“Kelly & Mao”译文均引自该版本。选择两种模型并非为了性能排名,而是观察不同模型是否出现相近的修辞处理倾向。

3.2 方法

研究采用阐释性文本细读,不对有限案例作统计推断。分析步骤为:首先识别原文的映射关系与反讽线索;其次比较各译文对词语、句法、语域和文化资源的选择;最后判断目标语读者是否仍能沿着相近线索恢复叙述态度。由于模型输出会受版本、时间和参数影响,本文结论仅指向所考察译文中的共性倾向,不能据此直接推断大语言模型的架构性边界。

4 研究发现与分析

基于前文提出的“意义建构—态度推导—形式实现”递进框架,四组案例呈现出由局部修辞弱化到复合修辞协同失效的变化。首先,文化负载隐喻主要检验目

标语能否恢复源语的认知映射及文化联想;其次,隐喻链进一步考察多个映射节点以及承载其关系的惯用表达、双关与节奏是否保持连续;再次,叙述反讽重点观察叙述者与评价对象之间的距离及读者的反向推理路径是否仍然存在;最后,当隐喻本身同时承担人物评价与反讽功能时,意义结构、语用态度及其修辞—文体实现形式便可能发生联动性弱化,形成本文暂称的“修辞塌陷”。下文据此比较人工译本与两种模型译文。

4.1 文化负载隐喻的释义化

本文所称“文化负载隐喻”,是指其意义不仅来自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概念映射,还依赖特定宗教、典故、习语或集体文化记忆才能充分激活的隐喻。按照 Lakoff 和 Johnson^[12]的概念映射观点以及 Mandelblit^[21]关于相似/不同映射条件的区分,这类隐喻的翻译不能只判断字面对象是否对应,还应考察目标语读者能否恢复相近的联想网络。Newmark^[9]提出的保留、替换与释义等策略也提示,当目标语本身已有可用的文化等值表达时,单纯解释源语意象可能反而削弱其修辞密度。本节以“文凭如树叶”为例考察这种释义化倾向。

“文凭如树叶”一段将《圣经》典故用于描写方鸿渐购买假文凭的行为:

例 1: 原文:“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Kelly & Mao: “This diploma, it seemed, had the function of the fig leaf worn by Adam and Eve—it could cover up one’s shame and wrap up one’s disgrace. This small square of paper could hide a person’s shallowness, ignorance, and stupidity.”

DeepSeek: “This diploma seemed to function like the leaf that Adam and Eve used to cover their lower bodies—it can conceal shame and hide disgrace. A small piece of paper can cover up a person’s emptiness, ignorance, and foolishness.”

Kimi: “This diploma, like the leaf over Adam and Eve’s lower bodies, seemed to have the function of covering shame and hiding shortcomings; a small square of paper could conceal a person’s shallowness, ignorance, and stupidity.”

按照概念隐喻理论,这一比喻至少包含两层映射:文凭与树叶都具有“遮蔽”作用;假文凭对知识缺陷的掩饰又使“遮羞”与堕落、欺骗等伦理联想发生联系。其反讽并不来自“文凭无用”的直接判断,而来自神圣

典故与世俗投机的突兀并置。人工译本使用英语中已经词汇化的“fig leaf”。这一表达既指亚当、夏娃遮体的无花果叶,又可比喻对可耻事实的表面掩盖,因而在 Mandelblit^[21]所谓可共享映射条件下有效调动了目标语既有资源,也符合 Newmark^[9]强调的功能性保留思路。英语读者无需额外解释,即可把“文凭”理解为体面外观下的遮蔽物,并同时感知其道德讽刺。

两个模型则分别译为“the leaf that Adam and Eve used to cover their lower bodies”和“the leaf over Adam and Eve’s lower bodies”。这些表达传递了故事事实,却把具有文化密度的“fig leaf”展开为说明性语句。“lower bodies”还把读者注意力引向身体部位,使原本凝练的典故显得生硬。就 Schaffner^[10]所强调的隐喻篇章功能而言,这里的问题并非单个词语的明显误译,而是文化联想网络没有在目标语中被重新激活:模型解释了典故所指,却没有调用目标语中现成的文化等值资源。结果是“遮蔽”这一表层映射仍然存在,原罪、虚饰和道德失格构成的深层联想明显减弱,反讽评价也随之变薄。这正体现了本节所说的文化负载隐喻“释义化”。

4.2 隐喻链中的双关与反讽联动

“隐喻链”是多个喻体或映射节点在同一语段中连续推进,并通过语义转接、双关或句法节奏共同产生修辞效果的结构。Schaffner^[10]强调概念隐喻具有篇章系统性,这意味着链条中的某一节点即使字面翻译正确,只要与前后节点的映射关系断裂,整体效果仍可能受损。对《围城》而言,隐喻链又常与反讽结合:读者需要沿着貌似严密却不断偷换概念的推演识别叙述者的贬抑态度。因此,本节不仅比较各译文是否保留三个意象节点,还考察双关、惯用表达和节奏是否继续联动。

鲍小姐的出场描写将“熟食铺子”“赤裸裸的真理”和“局部的真理”连成一条不断转向的隐喻链:

例 2: 原文:“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Kelly & Mao: “Some called her a charcuterie—a shop where cooked meat is sold—because only in such a shop is meat of so many different colors publicly displayed, warm and inviting. Others called her ‘Truth,’ for it is said that ‘the truth is naked.’ But since Miss Pao wasn’t exactly a stark naked truth, they revised her name to ‘Partial Truth.’”

DeepSeek: “Someone called her a ‘cooked food shop’ (charcuterie), because only a delicatessen would publicly

display meat of so many warm colors; others called her ‘Truth,’ because it is said that ‘truth is naked.’ Miss Pao was not completely naked, so they revised it to ‘partial truth.’”

Kimi: “Some people called her a ‘deli shop’ (charcuterie), because only a deli would openly display meat in so many warm colors; others called her ‘Truth,’ because it is said that ‘the truth is naked.’ Miss Pao was not entirely without clothes, so they amended it to ‘partial truth.’”

原文的修辞动力来自一套貌似严密、实则荒诞的推导: 暴露的身体被物化为陈列的肉; “赤裸”又把肉体引向抽象的“真理”; 鲍小姐并非全裸, 于是被称作“局部的真理”。叙述者没有直接谴责人物, 而是以概念偷换制造机智表象, 使贬抑态度寄生于隐喻推演本身。“局部的真理”同时意味着身体只裸露一部分和“部分真实”, 双关构成全段的收束。

人工译本并非简单复制字面结构, 而是利用英语惯用表达搭建新的联动。“stark naked truth”强化了“naked truth”的固定搭配, 同时把“stark naked”重新指向身体; 结尾大写的“Partial Truth”既像人物绰号, 又保留“不完整的真相”这一常规含义。这样, 英语读者仍可在身体、真理和真假程度之间来回切换。

两个模型的“truth is naked”在语法上成立, 却不如“the naked truth”或“stark naked truth”具有惯用性。更关键的是, 前一环未能激活固定表达, 后一环“partial truth”的双关便缺少支点。Kimi 的“not entirely without clothes”又属于解释性改写, 使原文快速推进的逻辑游戏变成平直说明。模型虽然保留了“charcuterie—truth—partial truth”三个节点, 却没有维持节点之间的语义弹性和节奏突转。按 Schäffner (2004) 的篇章系统性观点来看, 这说明隐喻链不能以逐项对应衡量; 而从 Sperber 和 Wilson^[14]的反讽观出发, 概念偷换和双关恰是读者识别叙述者疏离态度的重要线索。一环的惯用性不足, 因而会进一步削弱后续双关以及整体反讽。

4.3 叙述反讽中的语气弱化

“叙述反讽”并不依赖叙述者直接说出否定评价, 而是通过表面陈述与实际态度之间的距离, 引导读者完成反向理解。Grice^[13]从合作原则解释反讽中的表层失配, Sperber 和 Wilson^[14]则强调说话者对被回声话语的疏离态度; Mateo^[16]进一步指出, 反讽翻译的关键在于重建足以触发读者识别的语言与文化线索。因而, 本节关注的不是译文是否准确说明方鸿渐“懒散”, 而是

排比递进、先扬后抑、语域落差等线索能否继续维持叙述者的假装严肃与评价距离。

小说对方鸿渐留学生涯的概括展示了叙述者假装严肃的典型语气:

例 3: 源文: “方鸿渐到了欧洲, 既不钞敦煌卷子, 又不访《永乐大典》, 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 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 伦敦、巴黎、柏林; 随便听几门功课, 兴趣颇广, 心得全无, 生活尤其懒散。”

Kelly & Mao: “During his stay in Europe, Fang Hung-chien had not transcribed Tun-huang manuscripts, nor visited the Yung-lo encyclopaedia, nor hunted for documents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uch less studied Mongolian, Tibetan, or Sanskrit. In four years he had changed universities three times—London, Paris, Berlin. He had taken a few courses here and there, his interests had been quite broad, but he had gained nothing at all; as for his life, it had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laziness.”

DeepSeek: “When Fang Hongjian arrived in Europe, he neither copied Dunhuang manuscripts, nor consulted the Yongle Encyclopedia, nor searched for documents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nor studied Mongolian, Tibetan, or Sanskrit. In four years, he changed universities three times—London, Paris, Berlin; he casually attended a few courses, his interests were quite broad, but he gained nothing at all, and his life was especially lazy.”

Kimi: “After arriving in Europe, Fang Hongjian neither copied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nor visited the Yongle Encyclopedia, nor looked for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documents, much less learned Mongolian, Tibetan, or Sanskrit. Over four years, he had changed universities three times—London, Paris, Berlin—casually taking a few courses, with broad interests but zero gains, and his lifestyle was particularly indolent.”

原文先用“既不一又不—也不—更不”罗列多种互不相干、常人难以同时完成的学术任务。排比表面上像一份严肃的学术考核, 项目越堆越多, 考核标准本身便越显荒谬。随后“兴趣颇广, 心得全无”以高度对称的短语完成急转: 前半句似乎称赞, 后半句立即归零。反讽既指向方鸿渐的懒散, 也指向叙述者故意采用的不合理高标准。

人工译本以“not...nor...nor...much less...”恢复递进关系, 又借“quite broad, but...nothing at all”重建先

扬后抑。末尾“one of the greatest laziness”并非最自然的搭配, 却以轻微夸张保留了戏谑语气。DeepSeek 虽准确传递各项内容, 但连续使用中性的“nor”, 递进层次较弱; “his life was especially lazy”则将含蓄的戏剧性收束改成直接评价。Kimi 保留“much less”, 但“zero gains”带有报告或口语语域, 与小说叙述声音不协调。按照 Mateo^[16]关于反讽线索重建的观点, 两种模型都保留了命题信息, 却削弱了引导读者反向推理的形式线索; 从 Sperber 和 Wilson^[14]的角度看, 叙述者与表层陈述之间的疏离距离也因此缩短。反讽并非消失于信息错误, 而是弱化于表达过于透明。

4.4 比喻性反讽与“修辞塌陷”

前述三节分别从认知映射、语用态度及其具体形式实现考察译文, 本节进一步观察三者在“比喻性反讽”中的协同关系。结合 Colston 和 Gibbs^[17]关于反讽理解的元表征要求以及 Dynel^[18]对 metaphorical irony 的分析, 本文所称“比喻性反讽”是指隐喻不仅组织认知映射, 还直接为叙述者的疏离、贬抑或戏谑评价提供意义基础。因而, 判断其翻译效果不能只看喻体是否保留, 还要看叙述态度能否继续被推导, 以及承载二者的句法节奏、惯用表达等修辞—文体线索是否得到功能性重构。若这些层面发生联动性弱化, 并使目标语读者难以恢复原有复合效果, 本文将之暂称为“修辞塌陷”。

苏文纨把爱情比作被收藏至过时的衣服, 是隐喻直接承担人物评价的典型例子:

例 4: 源文: “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 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 宛如做了好衣服, 舍不得穿, 锁在箱子里, 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 有些自怅自悔。”

Kelly & Mao: “Miss Su had looked upon her love as something too precious to be given away casually. Now it was like a fine dress kept locked in a trunk, a dress one could not bear to wear but then, after a year or two, suddenly discovered to be out of style—much to one’s disappointment and regret.”

DeepSeek: “Miss Su regarded her love as too precious to be casually bestowed. Now, it was like a beautiful dress that one could not bear to wear and locked away in a box—after a year or two, one would suddenly discover that the style and color of this dress were no longer fashionable, and would feel somewhat regretful and remorseful.”

Kimi: “Miss Su considered her love too precious to give away casually. Now, it was as if she had made a nice

dress but was reluctant to wear it, locking it in a chest—then a year or two later, she would suddenly find that the style and color of the dress were out of fashion, feeling a bit regretful and self-reproachful.”

衣服隐喻的表层映射是“珍藏-过时-后悔”, 深层评价则来自喻体选择: 叙述者没有把爱情写成珍宝或花朵, 而是写成受时尚支配的衣服, 暗示苏文纨把爱情当作自我价值的展示品。表面的同情语气与潜在的幸灾乐祸并存, 反讽态度已经嵌入隐喻, 而不是附加在隐喻之后。

人工译本用“had looked upon her love as”提示这是苏文纨的自我估价, 在人物意识与叙述者判断之间留下距离; “out of style”又以简练的惯用表达同时指向衣服过时和人物处世方式失时。句末破折号使“disappointment and regret”成为轻巧的补充, 而非沉重的道德裁决。DeepSeek 把“不时髦”展开为“the style and color...were no longer fashionable”, 信息更全, 节奏却明显拖长; “regretful and remorseful”中的“remorseful”带有较重的道德悔罪意味, 改变了原文“自怅自悔”的轻微自伤。Kimi 的“had made a nice dress”拘泥于“做了”的动作表面, 使读者注意衣服制作, 而非收藏与过时之间的关系; “self-reproachful”同样把叙述者的轻巧嘲讽推向明确心理判断。

此案例中的模型并未丢失衣服喻体, 也没有误解故事结果, 但三个细小变化发生了联动: 映射焦点由“展示价值”偏向衣服制作和款式说明, 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变短, 句子节奏由含蓄突转变为完整解释。若依照 Lakoff 和 Johnson^[12]的映射视角, 喻体仍在而映射焦点已发生偏移; 若依照 Sperber 和 Wilson^[14]以及 Mateo^[16]对反讽态度与识别线索的强调, 叙述者的疏离位置又因解释性措辞而被压缩。单独看, 每一处都只是可接受的措辞差异; 合并起来, 读者却更容易把译文理解为对苏文纨爱情遭遇的直接描述, 而不易感受到叙述者借“过时衣服”嘲弄其自恋。本文暂称的“修辞塌陷”, 正是这种局部语义基本正确、但意义建构、态度推导与形式实现发生联动性弱化, 进而导致复合修辞整体效应明显减损的现象。综合四个案例可以发现, 大语言模型译文的主要风险并非明显错译, 而是一种“流畅的修辞损失”: 例 1 文化典故由联想触发器变成知识说明; 例 2 中, 隐喻节点虽然保留, 惯用表达、双关与逻辑转的联动却被削弱; 例 3 中, 评价过于明确压缩了读者反向推理的空间; 第 4 个例子这些局部弱化进一步在映射、态度与节奏之间形成叠加效应。前文

提出的三个分析维度并非彼此独立, 而是共同决定比喻性反讽能否在目标语中被重新识别。

5 结论

研究表明, 语义准确、语法通顺与文学修辞效果并非同一层级。Kelly 与 Mao 的人工译本有时并不逐字对应, 却能够调动目标语惯用语、文化记忆和节奏资源, 对原文的修辞功能进行补偿性重构; 相比之下, 两个模型更倾向于局部对应和意义展开, 因而可能在句子表面合理、信息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削弱复合修辞的整体组织。

文学翻译评价应依次考察命题意义、隐喻映射与文化联想、叙述态度与文体节奏。比喻性反讽尤其依赖喻体选择、语气距离和读者推理的互动。AI 译后编辑因此应从“纠错”转向“修辞审校”, 重点检查典故资源、隐喻连贯性、语气直陈化及解释性扩写造成的节奏损失。

本文仍存在三方面限制。其一, 语料仅来自《围城》前三章, 作品风格具有高度特殊性; 其二, 只比较两个模型在特定提示条件下的单组输出, 尚不足以作普遍性能判断; 其三, 反讽效果的判断依赖阐释, 尚未通过目标语读者实验验证。因此, 本文只能把“修辞塌陷”视为案例中反复出现的分析性概念, 而不能将其直接等同于大语言模型的架构缺陷。后续研究可扩大作品、语言方向和模型范围, 保存完整生成参数并进行多次采样, 同时结合母语读者评价, 检验不同译文中的反讽识别率和叙述态度感知。

总体而言, 大语言模型已经能够提供语义完整、表面流畅的文学翻译初稿, 但在《围城》的比喻性反讽处理中, 仍容易出现典故释义化、语气透明化和复合修辞协同失效。人的文学翻译价值由此不应仅被理解为纠正机器错误, 而在于重新组织目标语的文化联想、叙述距离和审美节奏, 使读者不仅理解人物“发生了什么”, 也能感受到叙述者“如何看待这一切”。

参考文献

- [1] HENDY A, ABDELREHIM M, SHARAF A, et al. How good are gpt models at machine translatio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J]. arXiv preprint arXiv:230209210, 2023.
- [2] GUERBEROF-ARENAS A, TORAL A. Creativity in transla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as a constraint for literary texts [J]. Translation spaces, 2022, 11(2): 184–212.
- [3] TORAL A, WAY A. What level of quality can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attain on literary text? [M].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From principles to practice. Springer. 2018: 263–287.
- [4] GAO R, LIN Y, ZHAO N, et al. Machin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a comparison among ChatGPT, Google Translate, and DeepL Translator [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4, 11(1): 835.
- [5] 葛颂, 王宁.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翻译: 挑战与机遇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4, (1): 94–101+149–150.
- [6] 吴恒球, 姚瑶, 李德超. 大语言模型的翻译指纹: 基于多维度分析的机器翻译共性探究 [J]. 外语电化教学, 2026, (1): 41–49+110.
- [7] 胡健, 范武邱. 基于提示词(工程)的大语言模型翻译实践: 特征、困境与对策 [J]. 中国外语, 2026, 23(2): 90–96.
- [8] 丁颖, 刘海涛. AI 赋能的翻译忠实度与读者接受度关系研究——以《小王子》8 个汉译本为例 [J]. 中国外语, 2026, 23(3): 106–112.
- [9]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series)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1, 7(1): 114–115.
- [10] SCHÄFFNER C.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some implications of a cognitive approac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4, 36(7): 1253–1269.
- [11] 李赞成, 郭世红. 从认知的角度分析《围城》英译本中隐喻的翻译 [J]. 科技信息, 2012, (36): 211–212.
- [12] LAKOFF G, JOHNSON M. Conceptual metaphor in everyday language [M]. Shaping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Routledge. 2020: 475–504.
- [13] GRICE H P, COLE P, MORGAN J L. Logic and conversation [J]. 1975, 1975, 41: 58.
- [14] SPERBER D. Irony and the use-mention distinction. In P. Cole (ed.), Radical Pragmatics, 295–318 [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15] ATTARDO S. Irony as relevant inappropriatenes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0, 32(6): 793–826.
- [16] MATEO M. The translation of irony [J]. Meta, 1995, 40(1): 171–178.
- [17] COLSTON H L, GIBBS JR R W. Are irony and metaphor understood differently? [J]. Metaphor and symbol, 2002, 17(1): 57–80.
- [18] DYNEL M. Two layers of overt untruthfulness: When irony meets metaphor, hyperbole or meiosis [J]. Pragmatics &

Cognition, 2016, 23(2): 259–283.

- [19] WANG S, ZHANG G, WU H, et al. MMTE: Corpus and metrics for evaluating machine translation quality of metaphorical language; proceeding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024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F, 2024 [C].

- [20] QIAN Z. Fortress Besieged (J. Kelly, & NK Mao, Trans.) [J].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3.

- [21] MANDELBLIT N. The cognitive view of metapho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theory [J]. Translation and meaning, 1995, 3(1): 483–495.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